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妇女史卷

本卷主编 姚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妇女史卷

本卷主编 姚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妇女史卷/伊沛霞,姚平
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25-5777-6
I. ①当… ②妇… II. ①伊… ②姚… III. ①汉学—研
究—世界—文集 ②妇女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8-53
②D44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5788 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妇女史卷

姚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5 字数 400,000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777-6

K·1348 定价:4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序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

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姚平译

1966 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 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年份。在那段时光里，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仍被普遍地称为“红色中国” (Red China)。虽然我的老师中有的曾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居住在中国，但我很明白我不可能有去中国的机会。

在 1966 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 19 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 (James Legge)、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卫德明 (Helmut Wilhelm)、威利 (Arthur Waley)、高本汉 (Bernard Karlgren) 等。此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 (Asia Major)、《通报》 (T'oung Pao)、《哈佛亚洲学刊》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 年贺凯 (Charles Hucker) 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 (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二千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

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1957年)及倪德卫(David S. Nivision)、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 in Action*, 1959年)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迅速壮大,而且其发展过程还反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以及学者成份的变化。本系列各卷编辑将在各分卷前言中讨论相关课题研究中的变化(如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和对宗教课题的渐趋关注等),但我想在总序中概括一下这四十年中影响着中国史众多课题研究的趋向当不无益处。

不言而喻,对历史学家来说,导致他们研究中国的原因往往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在我1966年至1971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许多人(men 那时的教授们几乎全是男性)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因此,在越战之类不少议题上教授和学生们的观点往往有极大分歧。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他们中有些是在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并在1949年后留在美国的,还有些是离开大陆到台湾,然后再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学者中不仅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

究中国的过去。这类学者包括萧公权、杨联升、瞿同祖、张仲礼、刘子健、许倬云、何炳棣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化以及阶级结构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20世纪的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大学中仍有一批教授是在二战前就与中国有关连的。他们中有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早已退休，但他每天来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编写《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他儿时在北京居住，曾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他一些教授则在上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期间萌生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当时美国能提供高级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大学屈指可数，而对美国人来说，在中国住上几年、请私人教师强化自己的汉学功底花费并不大。

我想我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可以被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①。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当这类研究生奖学金意味着可以推迟服役时，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骤然上升。当然，越战的影响并不只在于给男生一个留在学校逃避征兵的机会，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越战代”历史学家不能去中国大陆做博士论文研究，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亚洲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

70年代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口模式。70年代之前的二十年中，美国大学竭力扩大师资以适应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ers)，到了70年代，大学各系多已

^① 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旨在加强大学的跨文化课程。

人员齐备,而打算在几年内退休的教授又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中有不少顶尖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金融界、商业界或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不愿意或没有经济能力为一个合适的职位等上好几年。最后留在历史学界的往往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坚信唯有学术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这套翻译系列中的许多文章出自越战代/国防外语奖学金代学者之手,但更多的则是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新一代可以统称为“中国开放代”(Opening to China generation)。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研究生去中国学习及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终于成了一种可能。虽然在初期阶段双方都带有一点试探心理,但是80年代期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变迁。至80年代末,绝大多数重要的博士点在招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博士点所收的美国学生又大多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或是教英语,或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在博士课程中,语言训练已不再举足轻重。

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它还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逐渐扩大:档案馆愈来愈愿意让外国研究者使用档案资料;政府机构也逐渐接受面谈、民意调查及驻地考察等要求。所有这些使学者们更容易研究那些依赖于文献、珍本和考古材料的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进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论文的课题,而且前一代学者也迅速地利用这些新机会来修正他们的研究项目。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

上世纪80年代大量中国研究生来美国时,正是美国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在60年代期间,社会史研究占绝对优势。许多社会历史学家非常钦佩法国年鉴派的理论,他们探索能了解贵族层以下的平民百姓生活的研究方法,并力图发掘以计量证明的史料。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何炳棣在1962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此书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它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至80年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已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选择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课题。同时,在历史学家选择和设计研究课题时,他们往往从理论(特别是文学和人类学理论)框架着手。从中国来的研究生并不需要像美国研究生那样化大量的时间来对付史料阅读课,因此,他们往往选修一些与中国或亚洲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课。从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论著渐渐倾向于申明它们的理论性判断和主张。

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趋向之外,中国研究领域本身也有不少动态性变化。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讨论会及讨论会论文集的巨大作用。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福特[Ford]、梅隆[Mellon]基金会等)认为中国研究领域需要额外的资助;而从1951年起,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在以后取名为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赞助下,积极鼓励学者们合作研究一些高优先性课题。当时有不少基金会赞助的中国史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持续几天,并以详细评点个人论文为主要形式。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类讨论会,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杨联升,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 Mote),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倪德卫,加大伯克莱分校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和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等。此外,一些美国以外的著名学者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会,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傅海波(Herbert Franke)、王赓武等。

这种学者间合作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不久,美国学术团体(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中的中国文明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中的当代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接受

这一资助学术讨论会的传统^①，从而保持了讨论会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在70年代的十年中，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册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虽然这些论文集并不以历史为中心，但其内容多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如妇女研究、城市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组织研究等。此外，每册论文集中至少包括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文章。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专题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单独的时间段，它应该是跨学科的。在这套丛书中，《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75年)和《明清时期的城市》^②(*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年)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重大。从1982年起，中国联合委员会赞助的讨论会论文集陆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集是该社中国研究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加大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已有28册，我们这套翻译丛书中有两篇文章来自加大中国研究丛书中最有影响的论文集之一——《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年)。

参加这些委员会或各大学赞助的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史学者组成学术圈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讨论会之外，他们经常切磋交流，相互阅读、评点手稿。在历史学界的其他领域里，讨论会论文集的文章多被视为无足轻重，但在中国史领域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益的反馈，而且还因为文章被收入这类论文集确保了他们有大量的读者。我们这套丛书中有好几篇文章最初就是在这类论文集中发表的。

中国史领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们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由汉学传统决定的：早几代的历史学家往往化很长时间学中文，他们与研究中国文学、政治、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学生同进共出课堂多年。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特点：这个亚洲学中最有权威的学术团体每年召开年

① 这两个组织在80年代早期合并成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② 或译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会,使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机会与其他领域的中国学专家相聚一堂,并促使学者们去组织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小组。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60年代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模式的鼓励。“区域研究”的根本信条是:仅仅掌握某种语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打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必须在懂得语言之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美国人(或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来说,这种全面训练的最快途径是选修中国研究课程。不过,至90年代,“区域研究”模式受到了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猛烈抨击。许多院系不再愿意招聘“中国政治学家”(China political scientist)或“日本经济学家”(Japan economist)。区域研究专家往往在系里低人一等。大多数在社会科学院系教书的区域研究教授教的是公共课,他们每年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教有关中国的课程。所幸的是,中国史教授们大多躲过了这场对区域研究专家的攻击。在历史系,教授们专治一个区域和一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原始资料及其相关知识。因此,自9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成了大多数区域研究课程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的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尤其是考虑到四十年以来这一领域所得到的额外的研究基金。至少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成倍增长。我在1969—1970年期间准备我的博士资格考试时,学校对我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做笔记,居然也还应付过来了。时至今日,英语的历史期刊数不胜数,有些刊物还是中国断代史方面的,如《早期中国》(*Early China*)和《明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等(这两份期刊在我们这套翻译系列中占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专题著作和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也更趋频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生在准备资格考试时很少有试图看遍有关某一个朝代的英语著作的。所幸的是,综合性著作进展尚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重要的出版项

目是集体合作编写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它不仅是一套详尽的中国政治史,而且还分析性地介绍了有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当今中国史研究仍然受制于整个学术界和大环境的影响。从这套丛书的各卷目录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中吸引着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也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十分关注的。我想,对中国史研究中英语研究成果的趋向的回顾以及这套丛书的编辑促使我们去思考许多问题,如:身份标识(identities)及其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文化、民族、地区的界域,这些界域的重要性和它们的相互跨越性;以及本土视角(local perspectives)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形势仍然影响着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二十年以来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仅给我们在中国做研究创造了更舒适的条件,而且还造成了大学中中国史课需求量的增加,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更多在大学供职的机会,为研究性大学中国史博士点设立的扩大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

前 言

姚 平

西方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多致力于将妇女放回历史中,批判传统性别制度中的男女不平现象及其对妇女的桎梏。1981 年出版的由桂时雨(Richard Guisso)和约翰内森(Stanley Johannesen)合编的《中国妇女——历史研究的新动态》(*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历史学家们的先驱性探索^①。此书共收有 13 篇论文,分别考察了儒、道、佛三教中的妇女观、列女传统、缠足、溺杀女婴、寡妇守节,以及女性在家族制度中的地位等课题。桂时雨和约翰内森在前言中将这本著作形容为“迢迢千里之路”的“第一步”^②。显然,他们为中国妇女史研究开创一条非常有特色的道路——他们是第一批全面考察中国妇女在历史中的“演员”(actors)^③角色的历史学家。在这之后三十多年中,中国妇女史研究飞速发展,成为中国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

妇女史研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正如高彦颐(Dorothy Ko)、金滋炫(Jahyun Kim Haboush)和皮歌特(Joan Piggott)在《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女性与儒教文化》(*Women and Confucian*

① 费罗出版社(Philo Press)1981 年版。

② 同上,第 7 页。

③ 同上,第 9 页。

Cultures in Premodern China, Korea and Japan) 的前言中所指出的^①, 1986年, 司考特(Joan Wallach Scott)发表了《社会性别: 历史分析中的有用的范畴》(*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in Historical Analysis*)^②一文, 倡议历史学家从社会性别 的角度去考察历史。这篇著名的文章给中国妇女史研究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自90年代初起, 中国妇女史研究跳出了“男女不平等”的框架而立足于发掘、再现妇女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空间中的生活经历及社会角色。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包括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③、高彦颐的《闺塾师——十七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④, 以及曼素恩(Susan L. Mann)的《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⑤等。这三位学者的研究不仅描写了妇女在宋、明、清时代的性别化经历, 而且还着重分析了这三个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对她们的女性角色的影响、女性的能动性以及她们在这三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的贡献。此外, 中国近代妇女史的研究更以“性别化中国”(engendering China)为宗旨, 以社会性别为“手段”(method)来考察中国近代史中的国家、家庭、阶级、制度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潮^⑥。这些研究表明, 中国妇女史领域已经进入了一个独立、成熟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起是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第三个发展期, 这一时期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 研究课题细分化、多元化。这一时期著作

①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参见本书第一章。

② 司考特(Joan Wallach Scott), 《社会性别: 历史分析中的有用的范畴》,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91卷第5期(1986年), 第1053—1075页。

③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3年。

④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4年。

⑤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7年。

⑥ 参见柯临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贺萧、罗丽莎(Lisa Rofel)和魏台玉(Tyrene White)编, 《性别化中国: 妇女、文化与国家》(*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4年。

不仅趋向于探讨与妇女生活有关的个别现象,如妇女与医学、母子关系、婚姻法、财产继承权等,而且还非常强调妇女在各个时期的社会领域、性别制度、宗教体系、文化传承及经济实体中的角色与作用。代表性著作包括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阴盛:中国医学史中的社会性别,960—1665》(*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①、熊秉真的《慈航:帝国晚期的儿童与童年》(*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②、柏清韵(Bettine Birge)的《宋元时期的妇女、财产以及儒教反响》(*Woma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 [960—1368]*)^③、以及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科技与社会性别:帝国晚期的权力结构》(*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④等。

第二,这一时期的研究非常注重发掘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意识,如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美人与书:十九世纪中国的妇女与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⑤研究了19世纪女性主动追求作家地位、力争发表作品的现象;它还指出,在19世纪末,中国女性已成为小说的批判性读者、编辑者、评论家,这一现象又使小说界开始认识到迎合女性读者的重要性。本书中所包括的这一时期的作品也都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与此相应,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女性作品的翻译。最有影响的早期译集是孙康宜(Kang-I Sun Chang)与苏源熙(Haun Saussy)合编《中国女性诗人:从古代至1911年的诗歌及批评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⑥,而伊维德(Wilt Idema)与管佩达(Beata Grant)合编的《红毛笔:中国帝制时期的妇女

①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

写作》(*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是目前最完整的中国史中女性作品的译集^①。

这一时期的第三个特点是专题合作成果众多。随着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日趋成熟和研究者阵容的扩大,从90年代末起,不少学者组织了以中国妇女史中的某个方面(如宗教、传记、文学、国家与现代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和合作研究项目。因此,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妇女史专题论文集,如《激情的妇女》(*Passionate Women: 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②、《性别在行动》(*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③、《道教中的女性》(*Women in Daoism*)^④等。此外,1999年,以研究中国妇女史为主旨的《男女》(*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杂志在荷兰莱顿大学创刊,从2004年起《男女》定期出专刊,至今已出版了《晚清时期的政治、诗歌与社会性别》(第6卷第1期,2004)、《帝制中国时期的女性与医学》(第7卷第2期,2005)、《明代的男性友情》(第9卷第1期,2007年),以及《前现代史中的妇女、社会性别与宗教》(第10卷第1期,2008年)等四本专辑^⑤。

第四,留美中国学者的参与和贡献。正如伊沛霞在总序中谈到的,新一代的中国史研究者中包括了一批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他们有良好的史学和经籍基础,在美国第一流大学中就学于最优秀的中国史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不仅在选题和

①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罗溥洛(Paul S·Ropp)、曾佩琳(Paola Zamperini)、宋汉理编,《激情的妇女:明清时期的女性自杀》(*Passionate Women: 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布瑞尔(Brill)出版社,2001年。

③ 顾德曼(Bryna Goodman)、文棣(Wendy Larson)编,《性别在行动》(*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罗门-立特尔菲德(Roman and Littlefield)出版社,2005年。

④ 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孔利维(Livia Kohn)编,《道教中的女性》(*Women in Daoism*),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 《男女》原英文名为*Nan Nü: Men and Women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自2004年起改为现名。

理论框架上有突破,而且在史料运用上往往得天独厚。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Irvine)分校的胡缨曾就学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薄安坻(Andy Plaks)并于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至今她已在美国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并参与组织了不少与中国妇女史研究有关的学术研究活动。她的《译文的故事:撰写中国新女性,1898—1918》(*Tale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8—1918*)一书探讨了20世纪初中国有关西方女性模范的译作的复杂过程及与之相关的女性、国家、现代性的话语^①,是晚清民初妇女史研究的核心著作之一。此外,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卢苇菁曾师从曼素恩,她的新作《矢志不渝》(*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②在大量的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展示了明清时代贞女盛行所包涵的文化、社会、政治、历史和性别意义。更重要的是,她指出,贞女们并不是儒教礼仪的牺牲品,贞女盛行反映了女性对情、义的执著以及明清时期的女性赋权(female empowerment)的现实。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工作也正是由这样一批在美国获得或正在攻读历史博士的学者担当的,有几位还曾是作者本人的研究生。我相信,这批学者将在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起着愈趋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已经成果累累,不少专著也被译成中文,并深受国内读者的喜爱。但是,至今为止,这一领域中一些经典性的、开拓性的论文还未被介绍到国内来。我希望这本论文集不仅能弥补这个遗憾,而且还能系统地介绍西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现状,并使读者对西方研究性论文的选题方法、研究的切入点、结构与展开、以及论文写作与长篇著作的差别有所了解。由于本书的篇幅有限,我在论文选择上颇有难以取舍之感。最后,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时代分布的均衡;二,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的启发性、代表性;

①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此书的中译本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②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书的中译本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三,史料运用上的创意;四,在选题和研究切入点上的可借鉴性。当然,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文章都在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中有重大影响。

本书第一篇文章是由三位著名学者合编的《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女性与儒教文化》一书的前言。高彦颐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学院执教,她在国内明清史和妇女史领域已享有盛誉,她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也已在2005年以中文出版。此外,她又发表了《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化》(*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①、《灰姑娘的姐妹们:一份修正的缠足史》(*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②等著作,并逐渐将注意力从出版文化转移到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与妇女史的关系上。金滋炫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教授,主治朝鲜政治文化史、前现代民族主义、社会性别史,著有《朝鲜的儒教王权》(*The Confucian Kingship in Korea*)^③等作;皮歌特是南加州大学的历史教授,主治日本古代史,近著有《日本4世纪至12世纪间的都市与乡村》(*Capital and Countryside in Japan, 300—1180: Japanese Historians Interpreted in English*)^④等。除前言之外,《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女性与儒教文化》由11篇文章组成,分成四大主题:男性主导的话语(scripts of male dominance)、宣扬儒教美德(propagating Confucian virtues)、实践中的女性教育(female education in practice)、女性主体意识的肉体表达和文字表达(corporeal and textual expressions of female subjectivity)。

《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女性与儒教文化》的贡献在于全盘考察儒教对中国、朝鲜、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妇女的影响、其表现方式、以及妇女在各个社会、各个不同时期的协商(negotiation)方式。而“前言”

①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2006年。